

民国

杂志

刊物里的时代风云

《新青年》，时间开始的地方
《语丝》，从呐喊到彷徨
《新月》，兴起的自由之魂
《生活》，周刊，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独立评论》，书生论政的旗帜
《观察》，周刊，自由主义的嘹亮悲歌
《良友》，画报，眼睛的冰激凌
《东方杂志》，老资格的杂志店

周为筠◎著

一部别具特色的民国史 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子
小杂志，大历史；老杂志，新启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杂志民国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周为筠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9.7

ISBN 978 7 80251 212 2

I. 杂… II. 周… III. ①期刊—出版工作—中国—民国

②中国—近代史—史料—民国 IV. G239.296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999 号

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

作 者周为筠

责任编辑 陆建伟 谢艳芝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 7 80251 212 2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64222699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版权页

序言

《新青年》：时间开始的地方

欲救亡先启蒙

迟暮中的新曙光

同人们的呐喊

狂飙突进创世纪

新青年遇到老夫子

德先生与赛先生

吹响号角进入“五四”

救亡压倒启蒙

陨落的巨星

《语丝》：从呐喊到彷徨

自己的园地

语丝聚餐会

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

放逸而为“语丝体”

苦雨斋的弟子

从北京到上海

屋漏偏逢连夜雨

遥远的绝唱

《新月》：升起的自由之魂

一弯新月天如水

海上生新月

我寄愁心与新月

知识分子的内战

胡适向党国发难
罗隆基的政治炮火
中间道路踟躅前行
新月的沉落

《生活》周刊：一个时代记录者

黄炎培的教育报国
曲线就业之路
韬光养晦的奋斗
如鱼得水的生活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让无力者有力
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飞蛾扑火向光明
生活中孕育着新生

《独立评论》：书生论政笔墨报国

救国之道莫逾于此
独立之精神
国难声中的言人人殊
有政府要比没政府好
我们几个朋友
命运的歧路
出山要比在山清
书生报国功不唐捐

《观察》周刊：自由主义的啼血悲歌

幽暗的航行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以言论政的舆论空间
20年拆足了烂污

跋涉在第三条路

《观察》撰稿人

自由主义的分歧

悲壮的回光返照

一个时代的悲剧

《良友》画报：眼睛的冰激凌

做一个愉悦的战士

从鸳鸯派到海派

花样的封面女郎

国事家事天下事

良友遍天下

摩登都会的刺激

美丽事业的背后

倒向左翼的天平

画报元老的衰落

《东方杂志》：老寿星的杂货店

不即不离的把关人

杂志长寿基因的由来

转型期的公共空间

老杂志新作为

老杂志新作为

被遗忘的另一种启蒙

老树开出新花来

一个实习生的成才之路

新东方浴火重生

新年的梦想

后记

序言

民国热下的微言大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典籍记载历史事无巨细，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这么辉煌与漫长。老百姓对历史一直以来就兴趣浓厚，村夫野老茶余饭后都喜欢谈古论今，陆游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人称蔡中郎的东汉才子蔡邕，可见稗官野史的民间生命力。

不过历史热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仔细盘点下这几年一波一波的历史热中，分明看到各个朝代风水轮流转，不断更迭轮番上场，各领风骚二三年：先是清朝热，后来又“反清复明”，接着三国热，时下最为炙手可热却是民国了。电影电视里满是民国时的政治风云和风花雪月，网络报刊上民国成了拥有大量的粉丝群的热门话题。忽如一夜之间风气大开，人人都开始谈论章太炎、胡适之了。

一个暗发魅力的时代

各种矛盾交织纷繁复杂的民国时期，既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又是一个光怪陆离、醉生梦死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兵荒马乱、枭雄横行的时代，更是一个英雄辈出、志士如云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与六朝时士人辈出，给历史涂抹出诸多亮色，后来的天空却逐渐暗淡下来。唯有自晚清至民国之时，遇到了两千年来未曾有过之文化历史大变局，出现了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井喷气象。

民国热其实是清史热的衍生，清初由于文字狱的桎梏，士人都收敛了性情钻进故纸堆里做考据之学，这样后人写来写去也就是康乾盛世与宫廷政变那些事儿，而民国却因为大厦将倾，分崩离析出了极致的多彩斑斓，外来的和固有的东西交错碰撞出绚丽的色泽。

鲁迅、胡适、陈独秀、苏曼殊、周作人……这些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名字，背后站着的是昂扬的大师。有时读着他们激动人心的文字，便想象那让人怦然心动的时代和人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和掌故是那样多。

在那国危世乱、民生惨苦的日子里，士人们却每每以醉态笑傲江湖，其状比之魏晋风度乃毫不逊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现在已不再有那样的冲荡了，以今视昔恍若仰视天人，这让读书人心中甚是向往。

然而，讲述民国历史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向来却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但恰恰是这一段历史对当代知识分子影响比较大。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民国作为一个散发文化热力的名字，在文化界已如燎原之势蔓延，许多的作家学者都迷恋民国这一题材。记述民国人与事的忆旧怀人文字日见其多，这类文章在文化人心中颇多能激起神往的涟漪。

我一直对民国有着毫无掩饰的悠然神往，书房里满目发黄的民国旧刊与书籍，以至于充溢着民国的气息。读着那些力透纸背的酣畅之言，觉得两翼生风，飘飘然若豪侠志士，也有当年苏舜钦之“《汉书》下酒”的豪气之范。

写作这本《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是想立足一个独特的视角，把自己对民国的理解展示出来。从集纳大量丰润真切的历史细节中，再现民国的种种情境。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和狭窄，把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一种干枯的公式。关于民国历史更是由于禁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每每提及则满纸几乎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剥削政策，军阀和帝国主义激起了人民怎样的反抗，诸如此类等等。每个历史人物

都被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强行标准去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脸谱化、教条化的宣教使得好人和坏人都按照一个模子写。

这时期的人物比如梁实秋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写进教科书，闻一多被作为革命斗士广泛宣传，胡适之被贴上反动文人标签定格于白纸黑字间……这些概念化遮蔽了民国人物身上的精神理念，使得他们遭到历史的曲解与遗忘。刻板的历史写作不可能有鲜活的生命力，普通读者也觉得其面目生硬而不忍卒读。

胡适曾把历史比喻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政治是作为历史血缘最近的监护人，每次历史的书写都由着它去摆布和装扮，它可能就是幕后打扮这个的小姑娘的一贯高手。譬如每个新王朝建立后，都要按照本朝的意愿去修缮前朝历史，可以以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臧否人物和阉割真相。

历史往往又离不开政治，就如近代史学史权威学者尼泊尔所言：“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政治在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历史学家对政治大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如钱穆在蒋介石问及对政治的兴趣时说过：“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炎武）、黄（宗羲）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都大有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

其实，每个真正读史、研史和崇史的人心中都会殊途同归——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民国作为离现在最近的年代，和我们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对民国问题的讨论，都会指归到当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民国的话题，包括整个近代史的话题，大多属于雷区甚至禁区。

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气氛的宽松，很多学者作家开始重新审视民国这段历史。民国热就是当代思想界在反思和我们最为接近的时代，在对民国想象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思想谱系。把这段历史拿出来重新审视，是为了求解当代之谜；或以历史鞭挞现实，来戳破一些歪曲的谎言；或以追溯历史渊源，寻求现实行为和理论的合理性。

民国风流匪远，经过诸多研究者的拓荒，那些湮没的史实从时间的泥沙中被钩沉出，可谓是项功德无量的事业。而一些旧老亲历者如季羨林、何兆武等人，他们在垂垂暮年开始忆人怀旧，为师长树碑立传，追寻逝去的传统。这无疑为民国热多了几分榜样的力量。

很多学者作家提及民国，总有几分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的气态，其原因都大致是由于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的人物。反思书写民国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苦旅，追忆一个丰满的精神群落。

民国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那时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当人们对同一的现代面孔开始厌倦，必然在过往中寻找慰藉。

在各种原因的促进下，民国的书写于是处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国热使得民国题材的图书越发繁多，各种被冠以传记、写真的民国书籍琳琅满目，而且逐渐向娱乐化的另一种极端发展。有人研究民国的“吃喝玩乐”，有人钩沉民国“四大公子”，有人发掘民国人物的“绰号”……这些在长时间被屏蔽的历史“好玩”元素，通过各路英雄共同加工与一致想象，终于逃不过娱乐至死的命运。

方寸之间大乾坤

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逐渐被记者所代替。很多新闻人主观上并无此自觉，手中的笔却客观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新闻人成了历史的记录者，报刊成为历史的草稿。

这一时期凡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一能与报刊脱开关系的，有的甚至终身为新闻人。像笔扫千钧的梁启超，铁肩辣手的邵飘萍，奔走呼号的于右任，秉笔直书的张季鸾……他们言近意远尺幅千里，笔底暗涌的波澜直到今天仍能让人体味到，由此而能清晰地辨认他们的声音和足迹。

民国以来的报刊像浩荡的江水，奔腾不息而驰骋天下。“武昌起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莫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

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气云涌，蔚为大观。”报刊成了引导大众的舆论高地，近现代思想文化都与之息息相关。

杂志作为报刊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伴着列强图谋打开国门，由西方传教士传入，渐渐竟演化成知识群落的舞台。第一份中文杂志诞生于 1815 年，是在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是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国内才出现国人自办的杂志。这时大部分杂志在内外压力下惨淡经营，直到维新变法时杂志才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至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内杂志更如雨后春笋，据统计到 1919 年已达四五百种之多。

不过，杂志在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媒体中，地位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它时效性比不上“老大”报纸，深度比不上古老的书籍。但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杂志却当仁不让地拔得头筹。“世界新潮，澎湃东来，虽有大力，莫之能御。然一方面杂志之大声疾呼，使鼾睡者霍然醒觉。其影响亦非浅鲜，盖可断言。”

虽然不少杂志或是半途夭折，或是昙花一现，“不过从学术立场来看，这一大宗数量的杂志，是中国最近二十年来思想界的主要资料。对于介绍西洋学术、改进中国文化和一切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种种的问题，都是利用为发表讨论的中枢。——换句话说，中国 20 年来的主要思想，都集中在杂志的里面。”以至于著名新闻人戈公振在其名作《中国报学史》上，对杂志格外青眼相加，宣称“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

《新青年》、《语丝》、《新月》、《生活》周刊、《独立评论》、《观察》周刊、《良友》、《东方杂志》……这些杂志或致力于宣扬团体的理想，或只为唤醒昏睡的大众，或文人论政笔墨报国，或以笔为枪抵抗强权。这些杂志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当下，而且昭示后世。所以，这些杂志何尝不是一部部各具特色的近现代史，本书亦可谓既是新闻史又是思想文化史。

在摆脱了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后，这些关注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不再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的帮凶、帮忙或帮闲，他们目光超越了为一家一姓立言，触及到社会民生的各个层次。他们在杂志上留下的记录成了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时代最真实影子，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幅最接近事实的历史图景。

当传统仕途被阻塞后，这些杂志又成了知识分子的舞台。这就是所谓一个新知识道统，它不再是软弱的依附和无根的漂泊，而是开辟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他们矢志不渝新知识道统，通过一本本杂志来实践自己的理想，用知识和德性的优势对社会作出理性的批评，通过思想启蒙改变现实。

我们通过这些杂志，仿佛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他们的笔下流着墨也流着血，他们用新知识道统推动近现代社会一步步向前艰难迈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一直崇高甚至近于神圣，在像章学诚这样大史学家眼里“六经皆史”，龚自珍甚至说：“周之世，官大者史也。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写作历史过程中，“春秋笔法”时常为文人们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民国历史的写作也不例外。在追溯与重新审视民国这段历史时，可以发现现实与历史同构的地方，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伍德认为“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以当下体验和语境基础推衍出新的意义，民国这段历史的书写也不例外。

民国热确实有点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的意味。民国热对很多大众来说是看逸闻趣事，从民国题材里可以读到一些故事性的段子以供谈资，又可以了解到民国的世态人情丰富眼界，而一些作品其

中包含着的微言大义却不被重视。这些写民国历史的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核却潜伏在文字背后，只有用心去阅读体会，方能在字里行间觅得真意。

在民国热的过程中，各种关于民国同类作品蜂拥而至，从人物传记到口述历史应有尽有。但从这些以民国为主题的出版物，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界的分化，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在追求逝去的传统，对民国历史进行反思重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堆跟风媚俗的“水货”书，以编撰拼凑的方式来攫取市场的利润。

各种鱼龙混杂的出版物一起造成了民国的虚假繁荣，劣币驱逐良币，反而使一些真正有思想内力和历史关怀作品淹没其中。在日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背后，民国历史也正在遭受一次来自消费主义最强劲的解构。

民国这段历史承载了太多沧桑厚重的思想内容，又和当代血脉相连，从而才显得如此重要。那一时代最大的丰富性莫过人物的不旧不新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中又外。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民国时代，知识分子都在想办法救国拯民，在一个铁屋子里呐喊。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实业、革命、立宪、共和等这些主张的提出正反映出百家争鸣的盛况，正因为这些思想提出了，民智也大开了，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大概也是为何现代不复有现民国那些大师迭出之盛况的原因吧。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代很多的思潮分明能在其中找到影子。

书写民国这段历史同样，才、学、识这“史家三才”缺一不可。要在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民国真实面目，写出了国危世乱下的文人侧影，亦新亦旧的狂士风流同时，也让人能关注历史背后的逻辑。

今人谈起所钟情的民国人与事，每个人的理由虽有不同，但在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预设与憧憬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从民国中开掘资源，嚼一嚼民国所留下的思想文化余根。

周为筠于杭州

2009 年 4 月 20 日谷雨

《新青年》：时间开始的地方

寒夜沉沉，风雨如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外有欺凌的列强，内有腐朽的政府，下有民众的革命，形势动荡飘摇，云谲波诡。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专制无能的清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他们依循的是对外摇尾求媚、对内独裁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运动，疯狂地捕杀革命群众。

黑云压城城欲摧。《新青年》创刊的 1915 年前后，中国政治及思想界陷入了极度的沉闷与彷徨。先有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继之“二次革命”失败，后有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成立筹安会并复辟帝制。彼时，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的人间秩序安排已经轰然倒塌，而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仰还没有确立，人们忍受着人生意义的失落和社会政治的脱序所带来的渺茫，以及毫无希望可言的存在。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批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激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先进行思想革命才能挽中国于颓败之际，达到民主共和之理想。《新青年》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普遍的需要而诞生的，它像黎明前的第一声雄鸡啼鸣，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引发了百家争鸣。

《新青年》吹响了向两千年来旧思想、旧文化进军的号角，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同人们也都成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先锋或旗手！从此，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欲救亡先启蒙

1915 年 6 月的一天，太平洋上波涛汹涌，一艘客轮劈浪而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倚舷而望，任凭急风吹乱一头青丝。茫茫水域，前不见村庄，后不见大陆，唯有思绪翻滚起伏，浩浩如江海。这个人

就是后来被称为“思想界明星”、“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他正在从日本赶回上海的途中。

新文化运动旗手、《新青年》创办人陈独秀此前辛亥革命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了，但动乱的局面远没有结束，民国只是块幌子，君权与神权影响依然根深蒂固。1913 年陈焕章主编的《孔教会杂志》和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先后一个月内在上海创刊，鼓吹三纲五常等旧道德、旧伦理。孔教会人士还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

不久前，大总统袁世凯趁着夜色偷偷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于 5 月 25 日签成卖国协议。这激起了国人的抗议，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这天为国耻纪念日，各地纷纷出现反日、抵制日货的高潮。长沙一青年甚至不忍活在屈辱的国土上，以放弃生命的方式换回自由与尊严！国难未已，紧跟着中俄蒙协约签订，中国从此失去了对外蒙的统治权。

陈独秀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后，老革命党人的使命感使他再也坐立不住，他匆匆告别友人，打道回国，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建造共和、民主的道路。在陈独秀看来，要实现“共和政治”，首先得唤醒民众的国民意识和民主觉悟，因此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正如章士钊所评：“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此为章士钊 1947 年 1 月谈话，转引自郑学稼：《办青年杂志前陈独秀生活的片段》，《传记文学》第十三卷 4 期，1968 年 10 月 1 日。他既然确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便立即坚定地付诸于行。

陈独秀刚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落下脚，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灰尘，就奔向了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处。陈独秀是来恳请汪孟邹帮忙的，这是他第二次跟汪商谈办杂志的事。

第一次是在 1913 年。其时，陈独秀在安庆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遭袁党通缉，隐居于上海，虽然一无身份职业，二无经济收入，一箪食、一瓢饮，处江湖之远，济世雄心却丝毫未动摇。辛亥革命后

中国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受“二次革命”失败的刺激，陈独秀也难免苦闷与彷徨，但他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彷徨中反复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痛定思痛和深刻反省，他开始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之所以失败，乃在于没有进行文化思想革命，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于是他想到办一份杂志，把杂志办成思想炸弹，把不合时宜、阻碍革命的旧观念、旧思想、旧文化炸得粉碎，建立新伦理、新道德、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他经常到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汪孟邹十分欣赏陈独秀的才华，早在 1904 年 3 月他资助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小试牛刀就获得巨大成功。但当时亚东图书馆也是刚刚创立，实在没有余力办一份新杂志。不久，陈独秀受章士钊的邀请，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于是，办杂志的事便不了了之。

事隔两年，陈独秀再次向汪孟邹提出请求，汪出于自己实力等多方面的考虑，把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俩介绍给了陈独秀。陈氏兄弟听了陈独秀对新杂志的设想后，也想借助新刊物创建品牌，答应投资创办，每期编辑费和稿费为 200 元。

力于言、雄于事一直是陈独秀的个性，有了群益书社做后盾，他开始积极运作杂志事宜。首先，确定杂志名称。陈独秀认为杂志读者定位应为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因为当时政局动荡，钳制舆论、镇压革命的暴力有增无减，共和不可能短期实现，而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建立富强民主的新国家之希望自然落在了这一批人身上。

1900 年，梁启超曾发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梁启超振臂高呼，要中国独立富强，今日之责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这篇文章传播广泛，陈独秀也接受了这一思想。但是，1915 年前，人们说到青年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还多用“少年”称之，“青年”是个新词，多在基督教青年会中使用。为了有别以往，开创一时风气，陈独秀遂将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

就在《青年杂志》紧锣密鼓地筹办过程中，袁世凯授意之下的“筹安会”于1915年8月成立，图谋复辟帝制。这意味着袁世凯连“共和”的招牌也不要了。一股强大的复古逆流淹没了革命党人流血牺牲争得的果实，人民大众的政治生活陷入漩沼之中。

《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启迪时代智慧的思想源泉——《青年杂志》问世，第一卷1号格调雅正的红色印刷刊名：中文“青年杂志”四字靠封面右侧，法文“LA JEUNESSE”则高悬正中，这是因为陈氏欣赏法国大革命带来民主，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号召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杂志封面正中是英国人安德鲁·卡内基的头像，卡内基是“艰苦力行之成功者”的典型，刊内即撰有他的传记；封面上方为一排中国青年学生坐在长桌边，好像在聆听讲演。

甫一创刊，陈独秀撰写了有几分发刊词意味的《敬告青年》，满怀激情地讴歌：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青年杂志》，第一卷1号，1915年9月15日。

此文不啻为向青年人发表的一篇宣言，不仅因为是创刊号的开篇而分量显赫，更因其挑战性而振聋发聩。《青年杂志》以“青年”为主题词，意味着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这里的青年不是旧青年，那么什么是新青年？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青年杂志》，第一卷1号，1915年9月15日。